



第七十八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73(b)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问题，包括增进人权和
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促进和保护意见和表达自由权**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转递促进和保护意见和表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伊雷内·汗
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43/4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 A/78/150。

** 本报告逾期提交，以纳入最新信息。



促进和保护意见和表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伊雷内·汗的报告

摘要

在本报告中，促进和保护意见和表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伊雷内·汗探讨了性别化虚假信息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别是这类信息对妇女和非常规性别者以及对表达自由权的影响。她试图澄清性别化虚假信息的独特性质，这类信息既是一种压制妇女和非常规性别者自由表达的策略，也构成对他们安全和健康的威胁，并可能是一种网络性别暴力形式。特别报告员调查了导致性别化虚假信息因素及其负面影响，确定了应加以解决的知识和政策方面的重大缺口。她强调，妇女的安全权和她们的发言权之间不能有所取舍。她提倡“从性别平等的角度应对”网上的威胁，包括解决导致性别化虚假信息和性别暴力的根本原因。

一. 导言

1. 数字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以过去无法想象的方式扩大了表达、参与和分享信息的机会，但也使网上的风险和威胁成倍增加。性别化虚假信息并不是一个新现象，但新技术和社交媒体使之变本加厉，威胁、恐吓、伤害着妇女和非常规性别者，使他们无法发声，其负面影响远不止伤及目标个人，而是损害到人权、性别平等、包容性民主和可持续发展。

2. 尽管人们对网络性别化虚假信息所造成特别巨大的有害影响越来越担心，但对于什么构成网络性别化虚假信息，以及如何最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人们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关于性别化虚假信息如何促进网络性别暴力、其他不平等现象如何助长这类信息，也缺乏明确描述。没有一致同意的定义及知识的缺口，凸显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争议性和内在的政治性。

3. 特别报告员认为，必须澄清性别化虚假信息的独特性质，这类信息既是一种压制妇女和非常规性别者自由表达的策略，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一种网络性别暴力形式。必须了解驱动这类信息的因素是什么，谁受其影响，如何影响，谁是背后操纵者以及出于何种原因这样做。只有这样，国家、公司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才能制定有效的战略，打击性别化虚假信息，同时维护意见和表达自由权及其他人权。

4. 必须让数字空间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安全的，但为此采取的措施不应导致对表达自由的限制超出国际法允许的必要和相称的范围。意见和表达自由对于实现变革以增强妇女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权能、维护民主、促进性别公正至关重要。

5. 在过去一年中，特别报告员与民间社会组织和幸存者共同举行了一系列区域磋商会议，以便更好地了解世界各地在不同情况下日复一日与网上攻击作斗争的人们的真实经历。¹她还会见了各国政府和不同公司的人员，讨论了她所关切的问题。

6. 在本报告中，特别报告员根据磋商情况，并在其关于虚假信息的报告²和性别公正的报告³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网络虚假信息的性别层面。她明确了网络性别化虚假信息的主要方面，简要分析了国家、公司和民间社会的应对措施，确定了关切问题，并指出了一些新出现的良好做法。她提出了一些宽泛的建议，同时承认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和讨论。

7. 与她以前的工作一样，特别报告员采用了一个关注妇女生活现实和需要的女权主义分析框架。报告采取交叉分析方法，指出妇女的经历因种族、族裔、

¹ 特别报告员感谢进步通信协会在曼谷、亚的斯亚贝巴和贝鲁特分别为亚洲、非洲和中东及北非共同组织了区域磋商会议，并为拉丁美洲共同组织了在线磋商。特别报告员还在 2023 年 6 月举行的人权理事会会议期间与非政府组织进行了磋商。

² [A/HRC/47/25](#)。

³ [A/76/258](#)。

种姓、宗教、性取向、年龄、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和法律地位以及其他因素的不同而不同。

8. 性和性别都与性别化虚假信息相关。特别报告员虽然主要侧重于女性(在相关情况下这个词也包括女童)，但也酌情提及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性别存疑者(LGBTQ+)。

9. 特别报告员感谢各国政府、公司、民间社会组织和专家响应她的呼吁提供了 50 多份书面材料。⁴ 鉴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本报告仅为临时性报告，目的是就报告所载建议和今后应采取的步骤与各国、公司和民间社会进一步磋商。

二. 性别化虚假信息的架构

10. 性别化虚假信息是一种压制妇女和性别多样化声音的策略。在某些情况下，这也是一种网络性别暴力形式。在数字时代，这种现象的双重性质使得给这一问题下定义以及寻找解决办法都更加复杂和困难。

11. 在本报告这一节中，特别报告员“揭示”了性别化虚假信息的独特性质、背景挑战和相关国际法律框架。

A. 概念

12. 性别化虚假信息是基于性别的，因为攻击的性别性质及其性别影响，可知这类信息针对的是妇女和非常规性别者；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类信息强化了阻碍性别平等和性别正义的成见、偏见以及结构性、系统性障碍。

13. 性别化虚假信息有多重目的：把妇女描绘成软弱、无能者和性化对象，没有领导能力；将妇女和非常规性别者赶出公共空间和权力场所；禁止不遵守性别规范者发声。性别化虚假信息不仅攻击个人，而且还通过使女权主义和性别权利非合理化来攻击他们的集体斗争。⁵ 总体目标是破坏人权、性别平等、可持续发展与民主。

14. 与所有形式的虚假信息一样，性别化虚假信息试图传播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意图对个人和整个社会造成伤害。性别化虚假信息结合了网络虚假信息的三个鲜明特征：虚假、恶意、协同。⁶

⁴ 所有提交的材料均可查阅 www.ohchr.org/en/special-procedures/sr-freedom-of-opinion-and-expression。

⁵ 进步通信协会提交的材料。

⁶ Wilson Center, *Malign Creativity: How Gender, Sex, and Lies are Weaponized Against Women Online* (Washington, D.C., Wilson Center, 2021).

15. 与其他形式的虚假信息不同，性别化虚假信息不仅依赖假信息，而且依赖现有的性别叙事来实现其社会和政治目标，包括维持性别现状或使选民更加两极分化。⁷

16. 信息被操纵和放大，并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协同，以重申性别陈规定型观念，煽动现有的偏见和成见，并推动全面的负面性别叙事。这种信息含有厌女和性化的语言和图像，还可能包含明示或暗示的性别暴力威胁。经常叠加使用恐吓、羞辱和诋毁的手段，特别是针对妇女，将她们描述成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

B. 背景

17. 特别报告员在 2021 年关于表达自由和性别公正的报告中，提请注意压制、控制和惩罚妇女言论的歧视性法律、政策、做法、社会态度、文化规范和父权价值观。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和非常规性别者使用数字空间讨论、辩论家里和社区内禁忌的话题并建立支持网络，线下世界盛行的父权和厌女规范在网络平台上被复制和放大。⁸ 性别化虚假信息就是这个有毒有害环境的体现。

18. 在性别平等和妇女表达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性别化虚假信息特别猖獗。这种情况不仅在专制国家越来越明显，在新兴和成熟的民主国家也是这样。这是人权倒退和妇女权利倒退的危险模式的一部分。⁹

19. 由于性别化虚假信息的总体目标是塑造人们对性别和妇女在社会中角色的看法，并强化父权制和异性恋正统观的制度和结构，因此它具有很强的背景色彩。特别报告员共同组织的区域磋商会的与会者强调了地方背景在性别化虚假信息内容中的重要性。¹⁰

20. 在南亚，大多数虚假信息来自性别、宗教、种姓的交叉点。在非洲，“保护家庭”的说法很流行。女性政治家、记者和人权维护者往往被描绘成攻击家庭价值观的人。在非洲，反殖民主义叙事也被用来指责女权活动家和性别权利捍卫者屈服于“西方价值观”。在拉丁美洲，妇女和非常规性别者经常因宣扬“危险的性别意识形态”而受到攻击。

21. 在东欧，LGBTQ+团体意识到地缘政治和性别化虚假信息之间的联系，活动人士经常被贴上叛徒和西方间谍的标签。¹¹ 一项关于在欧洲联盟的针对 LGBTQ+人士的虚假信息研究的结果表明，以下一些说法反复出现：LGBTQ+人士代表西方“殖民主义”，是“对儿童安全的威胁”；性教育促进不自然的性

⁷ Center for Democracy and Technology, *Facts and their Discontents: A Research Agenda for Online Disinformation, Race, and Gender*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Democracy and Technology, 2021), p. 25.

⁸ A/76/258, 第 12-15 和 18 段。

⁹ María Isabel Puerta Riera, “Democratic backsliding in the age of misinformation”, *Democracy Paradox*, 9 November 2022.

¹⁰ 进步通信协会提交的材料。

¹¹ 同上。

行为和性别表达，并呼吁保护“自然”家庭的权利和恢复上帝所命定的“自然”秩序。¹²

C. 与性别暴力和仇恨言论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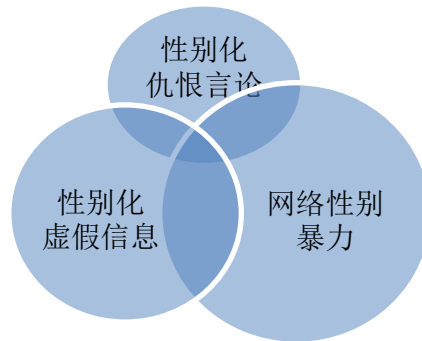
22. 人们以若干方式描述性别化虚假信息 and 性别暴力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性别化虚假信息被视为网络性别暴力的一个分支。¹³ 另一方面，在异性恋正统观父权制背景下，人们在网上遭受性别暴力，而性别化虚假信息也源于同样的背景，在某些情况下，性别化虚假信息和网络性别暴力之间可能存在重叠。¹⁴

23. 专门针对性别化虚假信息作出反应，需要理解这两种现象之间的明显不同和相似之处。网络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往往是性别化虚假信息宣传运动的一个因素，反之亦然。例如，在一项衡量网络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全球普遍性的调查中，67%的案件包括“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定义为散布谣言和诽谤以诋毁或损害妇女的人格）。¹⁵ 另一方面，性别暴力是比性别化虚假信息广泛得多的现象。例如，上述调查包括8项用于描述性别暴力的有害网络行为指标，而性别化虚假信息只是其中之一。

24. 性别化虚假信息还与仇恨言论相互交织。某些形式的性别化虚假信息鼓吹煽动暴力、敌意和歧视，可构成仇恨言论，但仇恨也可以包括不涉及造假、因此不构成虚假信息的煽动性言论。

25. 虽然性别化虚假信息、性别暴力和性别化仇恨言论之间存在重叠，但这三种现象并不是同义词(如下文所示)。这不仅是一个语义学问题，而且具有政策和实际影响。

性别化虚假信息、网络性别暴力和性别化仇恨言论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特别报告员。

¹² Cecilia Strand and Jakob Svensson, “Disinformation campaigns about LGBTI+ people in the EU and foreign influence”, European Parliament, July 2021, p. 7.

¹³ Wilson Center, *Malign Creativity*, p. 3.

¹⁴ Center for Democracy and Technology, *Facts and their Discontents*, pp. 24 and 25.

¹⁵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Measuring the prevalence of onlin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 March 2021.

26. 首先，适用于虚假信息、仇恨言论和性别暴力的国际法律标准不同。澄清三者间的关系不仅有助于确保制定有区别的对策，而且有助于确保这些对策符合各自的标准。

27. 第二，承认相似点和不同之处，凸显了性别化虚假信息的背景性质，并避免采用“一刀切”的解决办法。

28. 有必要对性别化虚假信息进行更多的背景化研究。设在全球南方的组织指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数据存在重大缺口，即使有数据，也未按性别分列，或没有反映问题的交叉方面。¹⁶

D. 国际法律框架

29. 虽然性别化虚假信息对许多人权都造成负面影响，但最相关的是与言论、性别平等和免受暴力有关的权利。

30.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第二款所载的表达自由权保护各种信息和思想，不论其内容真实与否。关于性别化虚假信息，必须指出，国际法不允许仅以虚假为由禁止言论。什么是假的，什么不是假的，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此外，言论通常包含不适合这种二元分类的观点和视角。国家实践表明，禁止“假新闻”的法律据称是一项打击虚假信息的措施，但实际上却被用来压制批评政府的言论。

31. 根据《公约》第十九条第三款，只有在限制是法律规定的，而且是在为了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名誉以及保护国家安全、公共卫生、公共秩序或道德的合法目标而绝对必要和相称的情况下，才可以限制表达自由。因此，诽谤法可以针对性别化虚假信息提供补救办法，但在实践中，民事诉讼是困难的，因为难以证明虚假信息造成的伤害，同时也因为在许多国家，妇女在诉诸司法方面面临诸多障碍。以刑事诽谤罪起诉是一种过度的反应，容易被滥用，包括针对妇女滥用这种方法。¹⁷

32. 国际法虽然没有提到“仇恨言论”，但禁止“构成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的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言论”的相应概念。¹⁸ 根据国际法所载性别平等和不歧视原则，禁止的范围被认为包含性和性别。禁止符合本条款所列标准的性别歧视。

33. 应当指出，经与法律专家协商制定并得到人权理事会认可的联合国指南要求严格谨慎地适用这一规定，并且仅适用于宣传行为构成煽动暴力的真实和紧

¹⁶ Neema Iyer, Bonnita Nyamwire and Sandra Nabulega, “Alternate realities, alternate Internets: African feminist research for a feminist Internet”, Association for Progressive Communications, August 2020, p. 8. 另见数字权利基金会提交的材料。

¹⁷ 特别报告员呼吁废除刑事诽谤罪。见 [A/HRC/47/25](#)，第 89 段。

¹⁸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条第二款。

迫危险的情况。¹⁹ 其他形式的鼓吹仇恨行为应通过其他措施加以解决，包括行政制裁、公众人物的谴责、提高认识、促进容忍和包容的社区方案和政策。

34. 国际法和区域人权文书都明确禁止性暴力和性别暴力。²⁰ 在国家一级，许多国家已将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定为刑事犯罪，有些国家还出台了禁止网络暴力的法律。然而，这些法律中有许多因没有效果而受到批评。在未对网络性别暴力或性别化虚假信息作出准确定义的情况下，这类法律有可能过度延伸并侵犯表达自由，而对处理性别化虚假信息却鲜有成效。

三. 幸存者、伤害、行为者和媒介

35. 在本报告的这一节中，特别报告员确定了：谁受到伤害，由谁伤害，以及性别化虚假信息造成的广泛伤害。关于这一专题的研究有一种倾向，就是列出与这两种现象有关的侵犯人权行为和有害行为，但对这两种现象却不加以明确区分。特别报告员承认这一缺陷，并注意到有关于性别化虚假信息具体资料的案例。

A. 幸存者

36. 一项全球调查显示，根据 8 项指标(包括一项关于性别化虚假信息的指标)衡量，网络性别暴力在互联网用户中的发生率为：欧洲 74%，亚洲及太平洋区域 88%，非洲 90%，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91%，中东 98%。²¹

37. 研究表明，妇女越引人注目，就越有可能受到攻击，这是蓄意恐吓、压制和排斥她们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的战略的一部分。²² 一些研究报告强调，女性政治家、²³ 记者²⁴ 和人权维护者受到的攻击尤为严重。²⁵ 根据各国议会联盟的数据，非洲 45%的女议员、欧洲 58%的女议员曾遭受网上攻击。²⁶ 在对来自世界

¹⁹ [A/HRC/22/17/Add.4](#).

²⁰ [A/HRC/38/47](#)，第 24-33 段。

²¹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Measuring the prevalence of onlin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 March 2021.

²² 见国家国际事务民主研究所提交的材料。

²³ 例如见 Lucina Di Meco and Kristina Wilfore, “White paper: Canadian women leaders’ digital defence initiative”; Kristina Van Sant, Rolf Fredheim and Gundars Bergmanis-Korāts, *Abuse of Power: Coordinated Online Harassment of Finnish Government Ministers* (Riga, NATO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Centre of Excellence, 2021); 以及 Reuters, “Dutch Finance Minister Kaag to leave politics citing family concerns”, 13 July 2023.

²⁴ Julie Posetti 等人, 《不寒而栗: 网上暴力侵害女记者行为全球趋势》(教科文组织, 2021 年, 巴黎), 第 12 页。

²⁵ [A/HRC/40/60](#)。

²⁶ [A/77/302](#)。

各地的 1 200 名女记者进行的一项调查中，73%的受访者表示，她们在工作中经历过某种形式的网络暴力。²⁷

38. 虽然研究和讨论(特别是在西方)往往集中于公共空间中杰出的职业女性，但事实上，性别化虚假信息出于从政治到个人的各种原因影响了更大的女性群体和非常规性别者。

39. 网上攻击，包括性别化虚假信息，是全球南方许多年轻妇女和女童每天在使用互联网通信和娱乐时要面临的现实。²⁸ 大多数女童报告说，她们第一次受到社交媒体骚扰的经历发生在 14 至 16 岁之间。²⁹ 由于儿童的身份不断变化，他们并不总是能够区分可靠和不可靠的信息。因此，他们不仅会受到虚假信息的伤害，而且还可能无意中在同龄人中传播虚假信息。³⁰

40. 性别化虚假信息针对个人身份的一个或多个方面，利用现有的社会分歧和紧张点(例如种族主义、同性恋恐惧和跨性别恐惧)做文章。在上述关于女记者的调查中，黑人、土著、犹太、阿拉伯和性别多样的记者遭受网络暴力的比率最高，后果也最严重。³¹

41. 性别化虚假信息对 LGBTQ+社区的影响尤其大，固化有害的刻板印象，并使他们进一步边缘化。³² 最近在 18 个国家进行的研究发现，据报告，在非常规性别者中，有人散布关于他们的谎言的比例为 29.3%，高于异性恋者(17.4%)。³³

42. 跨性别者，特别是跨性别妇女，一直是各种来源，包括排斥跨性别的激进女权主义者的性别化虚假信息宣传运动的目标，这些宣传运动恶意指控她们对社会造成伤害或“传播恋童癖”。³⁴

43. 在特别报告员共同组织的区域磋商会上，来自南亚的与会者强调了该地区虚假信息宣传运动中性别、种姓和宗教之间的交叉点。³⁵ 例如，在巴基斯坦，

²⁷ Posetti 等人，《不寒而栗》，第 12 页。

²⁸ Digital Rights Foundation, “Gossip and rumour mongering: analysing casual disinformation from gendered lens” in *Policy Papers: Perspectives on Gendered Disinformation*, Shmyla Khan, ed. (Lahore, Digital Rights Foundation, 2021) pp. 53–66.

²⁹ 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加快努力解决网络和技术促进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2022 年，第 5 页。

³⁰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数字错误信息/虚假信息与儿童”，2021 年 8 月，第 13 页。

³¹ Posetti 等人，《不寒而栗》，第 12 页。

³² 国际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协会提交的材料。

³³ Suzie Dunn, Tracy Vaillancourt and Heather Brittain, *Special Report: Supporting Safer Digital Spaces* (Waterloo, Canada,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2023), p. 38.

³⁴ Digital Rights Foundation, *Policy Papers: Perspectives on Gendered Disinformation*, Shmyla Khan, ed. (Lahore, Digital Rights Foundation, 2021), p. 74.

³⁵ 进步通信协会提交的材料。

围绕对 Aurat 游行(“妇女游行”)³⁶参与者亵渎指控的虚假信息宣传运动使许多组织者的生命受到威胁。³⁷ 2022 年, 该国一个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政治团体主要在社交媒体上就 2018 年跨性别者(权利保护)法案、针对具体跨性别活动家发起了一场虚假信息宣传运动。³⁸ 在印度, 一名穆斯林女记者 Rana Ayyub 对政府的政策和政府对待穆斯林少数群体的方式进行了批评性报道, 因此成为协同、恶毒的性别化虚假信息宣传运动的攻击目标。³⁹

44. 除种族、民族、宗教外, 其他与身份有关的特征也可能出现在性别化虚假信息中。例如, 在哥伦比亚, 有人利用暴力的 GIF 格式图像和手语视频剪辑攻击聋人群体的妇女代表。⁴⁰

B. 伤害形式

45. 性别化虚假信息造成的伤害形式多种多样, 对个人和整个社会都有深远的影响。在个人层面, 成为攻击目标的人往往在心理、身体、社会和经济上付出沉重代价。⁴¹ 在社会层面, 基于身份的网上攻击侵蚀公民自由, 削弱公共话语, 限制为政策和选举决策提供信息的能力, 并使所有妇女认为参与活动和公共服务是应避免的没有吸引力的高风险行为。⁴²

46. 性别化虚假信息不仅传播谎言, 而且还使用针对当地情况的高度情绪化和充斥价值观的内容, 破坏妇女的信誉和能力, 使之污名化并孤立她们。对女记者采用性别叙事, 从性的角度看待她们, 攻击她们的人格、诚信、外表和智力, 以此诋毁她们的报道, 阻止她们继续工作。⁴³ 在保守的社会中, 女性人权维护者的“荣誉”或名誉受到攻击。⁴⁴

47. 协同的公开羞辱可能导致家庭成员、同事和邻居转而反对目标个人。在传统社会中, 妇女依赖家庭和社区的保护, 她们会发现自己处境脆弱。在中东和北非举行的区域磋商中, 与会者强调了这方面以及男性家庭成员有时在虚假信息宣传和相关暴力中所起的作用。

³⁶ Amel Ghani, “Misinformation on YouTube: use of misleading titles to promote hateful narrative against Aurat March in Pakistan”, Media Matters for Democracy, July 2022.

³⁷ Sustaining Power: Women’s Struggles against contemporary backlash in South Asia, “Online disinformation: a weapon to silence feminists”, 11 October 2021.

³⁸ 数字权利基金会提交的材料。

³⁹ 见 UA IND 1/2020 和 UA IND 10/2018 号来文。

⁴⁰ 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Tweets that chill: analyzing onlin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politics”, 2019, p. 22.

⁴¹ 在区域磋商中提供的证词。

⁴² Sarah Sobieraj, *Credible Threat: Attacks against Women Online and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Oxford Studies Digital Politics Ser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⁴³ Demos 提交的材料。

⁴⁴ A/HRC/40/60, 第 37 段。

48. 性别化虚假信息可能导致公共生活中或新闻业的妇女离开网络空间，或者可能对她们的表达自由和继续从事专业活动的的能力产生寒蝉效应。⁴⁵ 有一项研究跟踪调查政治活跃女性在经历网上攻击之前和之后在 X (旧称 Twitter) 上的参与情况，发现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网络虐待降低了政治活跃女性继续参与社交媒体的意愿。⁴⁶ 在数字时代，这种现象大大削弱了公众人物和记者的外联活动、号召力和影响。

49. 最近一项研究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在报告经历了研究中所确定的某种形式网络伤害的参与者中，21.7%的人说，网络形式的伤害对他们表达政治和个人观点的自由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研究将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者作为一个亚群，发现网络形式的伤害对他们表达政治和个人观点的自由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晌(25.5%，而异性恋者为 19.5%)。⁴⁷

50. 各种形式的伤害还有一个削弱作用，就是它们往往超出直接针对的个人或群体的范围。例如，人们发现，由于受到性别化虚假信息的影响，妇女减少进入政界、新闻界或成为活动人士。⁴⁸ 一项研究表明，由于网上的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四分之一的女童对分享自己的观点感到不那么自信，五分之一的女童不再参与政治或时事，46%的女童感到悲伤、沮丧、紧张、担心或焦虑。由此可见，这种信息对年轻妇女和女童的抱负打击是特别大的。⁴⁹

51.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网络性别暴力助长了线下暴力，并在社会中创造了“不安全的气氛”。⁵⁰ 例如，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进行的一项调查中，13%的调查答卷人和许多受访者表示，他们收到过针对包括儿童和婴儿在内的亲近者的暴力威胁。⁵¹ 在上述《经济学家》资料处的全球调查中，92%的妇女报告说，网络暴力损害了她们的幸福感，三分之一的妇女在网上发布任何内容之前会三思而行。⁵² 资料中还记录了心理困扰、创伤和长期心理健康影响等情况。随网络性别暴力后，往往出现线下对妇女和女童实施的暴力。例如，五分之一的女记者报告说，她们曾遭到与网络暴力有关的线下虐待和攻击。⁵³ 在

⁴⁵ Amanda Lenhart and others, *Online Harassment, Digital Abuse, and Cyberstalking in America* (New York, Data & Society Research Institute, 2016); and Amnesty International, “Toxic Twitter – a toxic place for women” .

⁴⁶ 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Tweets that chill”, p. 21.

⁴⁷ Dunn, Vaillancourt and Brittain, *Special Report: Supporting Safer Digital Spaces*, p. 42.

⁴⁸ Lucina Di Meo, *#ShePersisted: Women, Politics, & Power in the New Media World* (2019), pp. 1–58.

⁴⁹ Plan International, “The truth gap: how misinformation and disinformation online affect the lives, learning and leadership of girls and young women”, 2021, p. 6.

⁵⁰ Jacqueline Hicks, “Global evidence on the prevalence and impact of online gender-based violence (OGBV)”,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8 October 2021.

⁵¹ Posetti 等人, 《不寒而栗》, 第 21 页。

⁵²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Measuring the prevalence of onlin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2020.

⁵³ Posetti 等人, 《不寒而栗》, 第 12 页。

阿拉伯国家，过去一年遭到网络暴力的妇女中有 44% 报告说，攻击转移到了线下。⁵⁴

52. 关于妇女和 LGBTQ+ 人士及其社区的负面叙事使针对她们的技术辅助暴力和身体暴力行为合理化。仇视变性者和仇视同性恋的思想声称性别和性角色是有限的，此类思想被用来宽恕对不符合这些歧视性规范者实施的暴力行为。⁵⁵

53. 在冲突环境中，虚假信息与暴力之间的界限、网上威胁与线下风险之间的界限可能难以区分，这增加了妇女面临的危险，并阻止她们发声或参与和平进程。⁵⁶ 由于害怕因不实指控而遭到报复，公开发言成为危险的举动，即使在联合国发言也是要冒风险的。⁵⁷

54. 性别化虚假信息传播关于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的虚假、误导性信息，侵犯了妇女的健康权。例如，在爱尔兰就堕胎问题举行全民投票期间，将堕胎与抑郁症、癌症和唐氏综合症联系起来的虚假信息在民众中传播。⁵⁸ 在意大利，反堕胎团体发起的一场运动错误地断言，堕胎是世界各地女性被害的主要原因。⁵⁹ 在拉丁美洲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虚假信息宣传的主题主要集中在性别暴力和堕胎上，质疑妇女的身体自主权，造成在这一权利的行使上出现两极化。⁶⁰

55. 虽然没有太多关于性别化虚假信息的具体数据，但一项研究估计，在欧洲联盟成员国，网络性别暴力给个人和社会造成的经济成本每年在 490 亿至 893 亿欧元之间。⁶¹ 这些数字的严重性表明，需要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研究，评估性别化虚假信息的具体成本。

⁵⁴ 妇女署，“加快努力解决网络和技术助长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第 6 页。

⁵⁵ Dunn, Vaillancourt and Brittain, *Special Report: Supporting Safer Digital Spaces*, pp. 13 and 15.

⁵⁶ EU Disinfo Lab, “Gender-based disinformation: advancing our understanding and response”, 20 October 2021.

⁵⁷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阿富汗：联合国专家对媒体传播虚假信息现象感到震惊”，2023 年 7 月 28 日。

⁵⁸ Plan International, “The truth gap”, p. 11.

⁵⁹ Cooperativa.cl, “Italia: Polémica campaña dice que el aborto es la principal causa de femicidios”, 15 May 2018.

⁶⁰ Andrea Malquín-Robles and José Gamir-Ríos, “Disinformation and digital sexism. Feminism and its agenda as an object of hoaxes in Spanish”, *ICONO 14*, vol. 21, No. 1 (February 2023).

⁶¹ Niombo Lomba, Cecilia Navarra and Meenakshi Fernandes, *Combating Gender-Based Violence: Cyberviolence: European Added Value Assessment*,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Study (Brussels, European Parliament, 2021).

C. 行为者和媒介

56. 对网络性别暴力潜在驱动因素的分析突出显示，权力和控制，以及围绕性别角色和性行为的异性恋正统观期望，是主要驱动力。⁶² 这些因素也推动了性别化虚假信息。

57. 非国家行为体在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或政治、社会或经济目标的驱使下，在组织协同的网络性别化虚假信息宣传运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虽然网络巨魔、白人民族主义者、男性权利活动家、游戏玩家、‘极右派’、持阴谋论者可能在信仰上存在很大分歧，但他们使用相同的策略，并在共同问题上达成一致。⁶³ 例如，事实核查小组 Chequeado 揭露了一个反权利团体网络，这些团体通过信息传递、资金输送、组织间战略联盟、培训奖学金和国际活动等方式相互协同，在美洲宣传性别化虚假信息。⁶⁴

58. 还有越来越多的报告表明，在一些国家，非国家宣传运动与国家政策和利益相结合，国家在本国境内或国外支持虚假信息宣传运动。⁶⁵

59. 社交媒体平台是使虚假信息传播达到新的规模、速度和范围的关键载体。数字环境不仅反映了线下妇女所面临的厌女症现象，而且还为有争议、情绪化、煽情的内容提供了空间和工具，使这种内容大为增加。

60. 算法推荐系统在加剧这一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抗性叙事利用人类追逐负面内容的倾向，特别推动平台上的参与。算法新闻推送制作自动生成的高度个性化的对抗性内容流，使用户在平台上保持参与，并实现货币化，这最终破坏了整个全球信息生态系统。⁶⁶

61. 协同，特别是“协同的不真实行为”，是虚假信息宣传运动日益重要的替代指标。⁶⁷ 网上虚假信息造成伤害的风险主要来自放大和协同的力量，其中施害者相互喂食内容，形成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⁶⁸ 虽然个别帖子孤立地看起来问题不大，但在协同和放大后，一个“虚拟暴民”发起的行动随时间的推移可能导致严重的威胁。

⁶² Hicks, “Global evidence on the prevalence and impact of online gender-based violence”, p. 2.

⁶³ Alice Marwick and Rebecca Lewis, *Media Manipulation and Disinformation Online* (New York, Data & Society Research Institute, 2017), p. 1.

⁶⁴ Olivia Sohr, “Desinformación de género: cómo se articulan los grupos que difunden falsedades sobre el tema en América Latina”, Chequeado, 29 June 2023.

⁶⁵ 见本报告第四节。

⁶⁶ Danny Rogers, “Disinformation as adversarial narrative conflict”, Global Disinformation Index, 22 June 2022.

⁶⁷ Wilson Center, *Malign Creativity*, p. 7.

⁶⁸ 进步通信协会提交的材料。

62. 除了伺机利用普遍存在的性别、种族和宗教歧视等薄弱点外，虚假信息宣传运动还利用选举、大流行病⁶⁹和其他重大新闻事件等“爆发点”来扩大影响。⁷⁰他们越来越多地使用“恶意创造力”——编码语言、迭代、基于背景的视觉和文本模因和其他策略，使性别化虚假信息的识别更加困难。⁷¹

63. 众所周知，传统媒体会有意无意地强化、复制、放大网上的性别化虚假信息，并使之正当合理化。⁷²许多媒体机构继续在其新闻和编辑评论中宣扬性别陈规定型观念，助长反性别平等叙事。这些机构未能在节目制作中采用性别视角，没有确保人们平等地获得专业机会，没有促进员工的性别多样性或为他们提供护理和安全，因而维持了一个性别化虚假信息泛滥的环境。⁷³

64. 缺乏多样性也是数字技术领域的一个问题，是导致政策和产品无视性别差异的原因之一。

四. 角色、职责和应对措施：国家

65. 大会和人权理事会申明，处理虚假信息的对策必须以国际人权法为依据。⁷⁴根据国际法，各国义务尊重、保护和实现人权，包括意见和表达自由权以及妇女在网上和线下免遭性别暴力的权利。

66. 国家行动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制定法律、政策和方案，处理网络虚假信息，解决根本的性别不平等，也有国家支持性别化虚假信息的令人不安的做法。

A. 打击性别化虚假信息

67. 各国在提交的材料中指出了打击性别歧视和网络性别暴力的各种法律措施、⁷⁵保护女性政治候选人免遭网络暴力和性别歧视媒体攻击的法律和司法决定，⁷⁶阻止媒体中性别歧视陈规定型观念的方案。⁷⁷

68. 国家一般通过三类法律来处理性别化虚假信息：与网络暴力有关的法律、专门针对虚假信息的法律、针对有害内容的社交媒体监管条例。

⁶⁹ Maria Giovanna Sessa, “Misogyny and misinformation: an analysis of gendered disinformation tactic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EU Disinfo Lab, 4 December 2020.

⁷⁰ 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Addressing online misogyny and gendered disinformation: a how-to guide”, 2021, p. 21.

⁷¹ Wilson Center, *Malign Creativity*, p. 1.

⁷² Digital Rights Foundation, *Perspectives on Gendered Disinformation*, p. 30. 另见人权高专办，“阿富汗：联合国专家对媒体传播虚假信息现象感到震惊”。

⁷³ A/76/258，第43和44段。

⁷⁴ 大会第76/227号决议和人权理事会第49/21号决议。

⁷⁵ 厄瓜多尔和西班牙提交的材料。

⁷⁶ 墨西哥提交的材料。

⁷⁷ 黎巴嫩提交的材料。

打击网络暴力的法律

69. 如本报告前文所述，某些形式的性别化虚假信息可能构成性别暴力。越来越多国家颁布了法律或更新了现有立法，禁止网络暴力或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删除暴力内容，但没有具体提及性别化虚假信息。

70. “仅仅有法律，并不一定意味着改变。”⁷⁸ 与民间社会的磋商表明，由于立法不完善、法律和政策执行不力、官员对网上威胁的性质和影响认识不足，以及对幸存者缺乏足够的支持，妇女在寻求网络暴力补救方面仍然面临巨大困难。⁷⁹ 例如，需要作出重大改进并进行大量投资，以改善法律，培训警察、检察官、法官和社会工作者，为其提供指导，采取行政和社会措施支持幸存者并增强其权能，解决网络暴力的根源。

71. 欧盟正在考虑，作为 2022 年 3 月提出的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和家庭暴力指令的一部分，将某些形式的网络性别暴力定为刑事犯罪。⁸⁰ 该指令将为网络跟踪、未经同意分享亲密或被操纵的材料、网络煽动暴力或仇恨行为确立最低刑事标准。

打击虚假信息的法律

72. 随着网络虚假信息的风险和危险变得日益明显，许多国家通过了禁止网络“虚假新闻”的法律。⁸¹ 这些法律在几个方面引起了关切。首先，这些法律是不分性别的，因此没有解决性别化虚假信息带来的独特挑战。⁸² 其次，这些法律往往使用模糊和过于宽泛的虚假信息定义，设定的刑事处罚过高，并赋予当局过度的自由裁量权，迫使相关平台在没有司法监督的情况下删除内容。这些法律基本上不符合《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限制表达自由的标准，即合法性、必要性、相称性和合理目的。

73. 通过宽泛而模糊的法律将言论定罪，可能会扼杀表达自由。这些法律是为了打击虚假信息而通过的，但却被用来起诉和惩罚批评政府的人。⁸³

74. 女性权利活动家指出，将言论定罪的法律越来越多地被用来对付妇女，例如在巴基斯坦，将亵渎神灵定为犯罪的法律被用来对 Aurat 游行（“妇女游行”）定罪。⁸⁴ 在印度尼西亚，性暴力幸存者因在网上讲述自己的经历而遭到刑事诽

⁷⁸ 互联网实验室提交的材料。

⁷⁹ A/76/258，第 65 段。

⁸⁰ 欧洲联盟，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关于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和家庭暴力的指令提案，可查阅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52022PC0105>。

⁸¹ A/HRC/47/25，第 52-55 段。

⁸²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提交的材料。

⁸³ A/HRC/47/25，第 52 段。

⁸⁴ 数字权利基金会提交的材料。

谤罪起诉，起诉的目的是诋毁她们，阻止她们发声。⁸⁵ 一些国家以“公共道德”为由惩罚妇女的网络社交行为，而网络平台上的性别化虚假信息却没人管。⁸⁶

社交媒体监管

75. 各国以多种方式对社交媒体进行监管。一些国家直接干预平台，迫使它们删除被视为非法的内容。违规者处以巨额罚款或封锁内容。⁸⁷

76. 另一些国家通过了法律，规定平台按义务删除某些内容或面临后果的标准和程序。如果法律所载定义模糊、回应时间较短、违规罚款极高的话，可能会使公司依赖使用人工智能的自动内容审查，并进行过于宽泛的内容删除。这种监管可能损害表达自由，却无法阻止性别化虚假信息。

77. 在强调“架构重于拆除”的系统性监管下，可以采取更相称的应对措施，并可能更好地符合言论自由标准。⁸⁸

78. 欧洲联盟通过《数字服务法》采取了一个很好的办法，根据该法，国家不干预内容，而是要求公司进行尽职调查和影响评估并保持透明度。该法要求大型在线平台和搜索引擎在独立审计的监督下进行风险评估，有效评估和减轻其服务的设计和运营所产生的系统性风险。⁸⁹ 《数字服务法》具体提到应对性别暴力风险，并多次提到虚假信息对民主和选举构成的风险。⁹⁰ 该法案最近于2022年11月16日生效。

79. 欧洲联盟还加强了最大社交媒体平台的反虚假信息行为守则。

B. 促进性别平等

80. 各国有义务主动消除性别平等的结构性、系统性障碍，包括父权制和性别陈规定型观念，以及助长性别化虚假信息的负面社会规范、观念、习俗和行为。各国政府都作出了承诺，许多国家的政府还制定了国家行动计划和方案，促进性别平等，消除性别歧视和陈规定型观念。然而，性别化虚假信息的广泛存在、国家支持和纵容的针对妇女和非常规性别者的虚假信息出现，证明各国还要再接再厉，改变对妇女、女童和非常规性别者的文化规范和态度。

⁸⁵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提交的材料。

⁸⁶ A/76/258，第24和25段。

⁸⁷ 例如见OL IND 8/2021和OL BGD 2/2023号来文。

⁸⁸ Lorna Woods教授提交的意见书。

⁸⁹ 欧洲联盟，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2022年10月19日关于单一数字服务市场的第2022/2065号条例，并修正了第2000/31/EC号指令(《数字服务法》)。服务提供商的义务包括全面评估其服务对基本权利造成的系统性风险(第34条)，制定和执行缓解措施(第35条)，接受独立审计以评估其工作(第37条)。

⁹⁰ 同上，第34条和序言部分第83和84段。

81. 有两个问题值得各国特别注意：妇女上网机会的不平等和性别数据缺口。国家不仅有责任使互联网对妇女而言是安全的，而且有责任确保她们有效联网。⁹¹

82. 互联网是一个进行动员的空间，也是人们可以围绕性别问题、包括质疑性别化虚假信息的内容组织起来的一个重要场所。妇女上网机会不平等、缺乏安全工具、对网络安全的了解有限，意味着她们更容易受到虚假信息和技术助长的暴力行为的伤害，同时也更不具备应对能力。这种情况造成了传播反性别平等叙事者和对抗反性别平等叙事者之间的严重失衡。

83. 虽然 132 个国家通过了关于知情权的法律，但在许多国家，不仅妇女获得信息的机会不多，而且缺少按性别分列的关键问题数据。⁹² 缺乏关于性别问题的可靠、可核查的信息，增加了虚假信息产生和传播的风险。国家有积极义务促进实现知情权，主动提供关于妇女所关心问题(如性和生殖健康)的事实和可核实的数据。

C. 支持性别化虚假信息

84. 无论是由国家行为体直接协同，还是由非国家行为体在国家的明确支持或默许下进行，性别化虚假信息的传播都可能非常强大，因为国家掌握权力、资源、媒体资产、网络巨魔场和影响力网络，并且国家行为体对数字平台施加压力，使平台不能对虚假信息宣传运动采取行动。

85. 各国在网上和线下使用各种战略、战术，包括在多个平台上精心策划网上宣传运动、制定法律和政策限制或操纵有关性别问题的信息。高级官员和政治人物经常发表煽动性厌女言论和负面的性别叙事，营造有毒的大环境，使非国家行为者敢于攻击妇女和非常规性别者。特别报告员与区域组织的任务负责人一道，谴责政治家和公职人员公开发表针对记者和人权维护者的不容忍、分裂、虚假和受操纵的言论，并呼吁各国和政党制定和执行其官员与公众沟通的行为守则。⁹³

86. 在菲律宾，国家最高政治层针对诺贝尔奖获得者记者玛丽亚·雷萨发布了性别化虚假信息，并且时任总统杜特尔特的追随者扩大传播了这些信息。⁹⁴ 国外的个人和团体也成为国家攻击的目标。来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性别化虚假信息在网上攻击将矛头指向英国广播公司波斯语广播站的记者和媒体工作者，以及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其他散居国外的记者。⁹⁵

⁹¹ [A/HRC/53/25](#)，第 29-31 段。

⁹² [A/76/258](#)，第 36 段。

⁹³ Joint Declaration on Politicians and Public Officials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2021, 可查阅 www.osce.org/files/f/documents/9/4/501697_0.pdf。

⁹⁴ AL [PHL 12/2018](#) 号来文。

⁹⁵ AL [IRN 10/2022](#) 号来文。

87. 在巴西，雅伊尔·博索纳罗于 2018 年当选总统后，反权利言论成为政治的一个突出和有毒的方面，其特点是总统和其他高级官员发表歧视性、煽动性公开声明，精心策划社交媒体运动，诋毁报道性和生殖健康权利的记者、女权主义者和非常规性别活动家，特别是那些具有交叉身份的人，对目标个人造成可怕的后果。⁹⁶

88. 公职人员针对 LGBTQ+ 群体的污名化言论营造了一种助长暴力侵害该群体成员、性别权利活动家、致力于保护这些群体权利的人权维护者的环境。⁹⁷ 匈牙利⁹⁸ 和乌干达⁹⁹ 的情况即是如此。

89. 一些国家对性和生殖权利及健康方面的信息加以污名化和限制，理由是这些信息固化“性别意识形态”，并威胁到文化、宗教、传统价值观和父母权利。¹⁰⁰ 这种不实陈述违背了国家促进实现知情权的义务，助长了一种有毒的环境，使捏造的信息备受追捧，促进了原已存在的性别陈规定型观念。¹⁰¹ 在波兰，妇女安全堕胎的途径受到严格限制，一些公职人员、政治及宗教人士支持或纵容煽动性言论、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¹⁰²

90. 阻碍获得关于性和生殖健康的准确、真实的信息，可能对一系列人权产生严重影响，包括危及妇女和女童的生命和健康。¹⁰³ 在肯尼亚，政府发布禁令，禁止向青少年和青年提供关于堕胎和如何获得帮助的信息，非政府组织成功对此提出了质疑，理由是该禁令侵犯了获得信息的权利、表达自由权和健康权。¹⁰⁴

五. 角色、职责和应对措施：公司和民间社会

A. 公司

91. 公司有责任尊重所有人权，包括性别平等以及意见和表达自由权。根据《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社交媒体公司应尽职尽责，定期对产品、业务和

⁹⁶ Horacio Sivori and Bruno Zilli, *Anti-Rights Discourse in Brazilian Social Media Digital Networks, Violence and Sex Politics* (Rio de Janeiro, Brazil, Latin American Center on Sexuality and Human Rights, 2022). 另见互联网实验室提交的材料。

⁹⁷ 人权高专办，“联合国专家警告说，LGBT 人士的人权捍卫者不断面临风险”，2022 年 3 月 24 日。

⁹⁸ 见 [A/HRC/50/29/Add.1](#)。

⁹⁹ 见 [AL UGA 4/2022](#)、[AL UGA 3/2022](#) 和 [AL UGA 5/2021](#) 号来文。

¹⁰⁰ [A/HRC/38/46](#)，第 14 段；[A/72/155](#)；[A/76/258](#)，第 37 段。

¹⁰¹ 生殖权利中心提交的材料。

¹⁰² 人权高专办，“波兰：联合国专家说，维护所有权利是结束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关键”，2023 年 3 月 9 日。

¹⁰³ [AL BRA 1/2023](#) 号来文。

¹⁰⁴ 生殖权利中心提交的材料。

政策进行人权评估，以确定、预防或减轻对人权的实际或潜在不利影响，并提供补救。

92. 目前尚不清楚社交媒体平台在多大程度上遵循这些准则。显而易见的是，网络性别化虚假信息普遍存在。妇女、非常规性别者、民间社会和大多数政府普遍认为，公司未能在其平台上处理这类信息。

93. 人们的主要关切涉及这些平台的内容审查、商业模式和透明度不足的问题。

内容审查

94. 包括 Facebook、X、YouTube、Instagram、TikTok 在内的许多主要平台都禁止仇恨言论、骚扰、暴力和虐待宣传，并删除攻击性内容以及反复违反服务条款或社区准则的用户。然而，一些平台以最低限度内容审查为荣。例如，Telegram 被描述为拥有“最厌恶女性、最具辱骂性的内容，其内容审查和平台政策似乎是最‘放手不管的’”。¹⁰⁵

95. 执行反骚扰政策的平台采用自动化主动检测、人工审查、用户报告反应侦测(然后由自动化系统或人工审查员裁定)相结合的方式识别侮辱性内容。这些平台结合政策、产品干预、功能和执法措施，来应对虚假信息，限制虚假信息传播，为用户提供更多获得权威信息或背景知识的途径，并通过数字扫盲和互联网接入等办法促进社区应对和社会复原力。¹⁰⁶ 他们经常与外部组织合作，通过事实核查来识别“虚假”信息。

96. 对平台的内容审查政策和做法进行更仔细的分析后，人们发现，这些政策和做法在应用于性别化虚假信息时存在严重缺陷。¹⁰⁷ 问题包括：“一刀切”的做法，没有认识到或没有解决性别化虚假信息的独特性；投诉程序繁琐；背景知识和当地语言技能不足；社区标准适用不均衡。

97. 性别化虚假信息通常不会被发现，因为平台内容审查人员缺乏必要的背景知识、当地语言和性别平等意识，无法识别驱动这类信息的性别叙事。“恶意创意”使用各种媒体形式以及在没有任何上下文的情况下似乎无害或无意义的编码图像，得以逃避自动检测和过滤。¹⁰⁸ 对单个帖子进行事实核查、提供获取权威信息的途径、贴标签和“轻推”等用于打击虚假信息的方法，对于性别化虚假信息来说，效果要差很多，因为性别化虚假信息依靠根深蒂固的现有偏见和社会分歧为其虚假或被操纵的信息建立可信度。¹⁰⁹

¹⁰⁵ 战略对话研究所提交的材料。

¹⁰⁶ Vera Zakem, Kip Waincott and Daniel Arnaudo, “Platform specific engagement for information integrity”, Consortium for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Process Strengthening, 可查阅 <https://counteringdisinformation.org/topics/platforms/0-overview-platforms>。

¹⁰⁷ Wilson Center, *Malign Creativity*, p. 8.

¹⁰⁸ 同上。

¹⁰⁹ Demos 提交的材料。

98. 人们把报告机制形象地描述为“对着虚空叫喊”。报告机制即使存在，也是繁琐的，有时令人困惑。这种机制往往迫使用户将经历归入预先确定的类别，而这些类别却无法反映用户所面临的虐待的多方面性，特别是在网络性别暴力与虚假信息交织的情况下。¹¹⁰

99. 大多数报告机制要求被攻击目标报告虐待行为。这不仅对个人造成创伤，带来不公平的负担，而且还显示出，这些机制采用一种零敲碎打的方法来解决性别化虚假信息风险因素和系统性原因，而这些因素和系统性原因要通过系统化主动战略才能解决。¹¹¹不能在“逐条评论”的基础上处理协同的性别化虚假信息宣传运动。¹¹²

商业模式

100. 性别化虚假信息泛滥问题的核心在于社交媒体公司的商业模式。¹¹³注意力经济学、内容集展、自动广告和性别化虚假信息的扩增是密切相关的。

101. 虚假信息，包括性别化虚假信息，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业务。大型中介机构的主要收入来自广告的买卖和营销。¹¹⁴平台通过有针对性的广告将注意力货币化，使用复杂的统计模型来预测用户与内容的互动并使之最大化。一个人花在滚动和点击上的时间越多，公司就能收集到越多的数据，就能卖出越多的广告。

102. 内容集展建立在对个人的描述和微定位的基础上，最终是为了服务于平台的广告目的。有针对性的广告使算法被定制以培养关注度和参与度。培养注意力的做法会影响人们收到的内容和广告源的优先顺序，以及推荐给他们的内容。¹¹⁵

103. 推荐系统倾向于推广吸引注意力的挑衅性内容。研究表明，这些内容的认知难度较低，更容易产生情感共鸣。¹¹⁶平台推荐系统为提高用户参与进行了优化。平台推动放大煽动性、有争议、让人产生分歧的信息，是因为这种信息直接与推荐系统的商业和技术基础设施匹配。

¹¹⁰ Viktorya Vilks and Kat Lo, “Shouting into the void: why reporting abuse to social media platforms is so hard and how to fix it”, PEN America, 29 June 2023.

¹¹¹ 同上。

¹¹² Demos 提交的材料。

¹¹³ 特别报告员以前曾对虚假信息表示过类似的关切。见 A/HRC/47/25。

¹¹⁴ Consumer Council of Norway, “Time to ban surveillance-based advertising: the case against commercial surveillance online”, June 2021, 可查阅 <https://storage02.forbrukerradet.no/media/2021/06/20210622-final-report-time-to-ban-surveillance-based-advertising.pdf>, p. 21。

¹¹⁵ Tech Transparency Project, “Facebook profits from white supremacist groups”, 10 August 2022.

¹¹⁶ Carlos Carrasco-Farré, “The fingerprints of misinformation: how deceptive content differs from reliable sources in terms of cognitive effort and appeal to emotion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vol. 9, No. 162 (2022).

104. 平台直接收集和挖掘第一方数据的能力是注意力经济模型的主要组成部分(不仅适用于社交媒体平台,也适用于搜索引擎和其他平台上的搜索功能)。它破坏了隐私权和个人数据保护。

105. “广告技术”政策、隐私权保护不足、数据保护执行不力,助长了虚假信息内容的货币化,使针对边缘化和高危群体的敌对言论得以延续和传播。¹¹⁷ 如果不解决商业模式的这些方面并确保对隐私和数据的有力保护,解决性别化虚假信息的对策就不太可能取得效果。

透明度

106. 互联网平台,特别是社交网络服务,需要提高运营透明度,使研究人员和活动家能够更好地了解虚假信息的范围、动态和性质。

107. 推荐系统和算法使用的透明度有助于让平台承担责任,并实现更多的循证决策。广告透明度至关重要。考虑到广告商锁定目标用户的粒度,公司必须提供更多的信息,说明用户为什么会看到广告,并说明公司对包含虚假信息内容广告的服务条款的执行情况。

B. 民间社会：社区应对措施

108. 在社区一级出现了各种举措,重点扶持和增强目标群体的能力。

反击言论

109. 反击言论一直是一种成功的应对策略,涉及质疑或嘲笑陈规定型观念和规范、揭露仇恨言论、揭露性别化虚假信息,¹¹⁸ 强调成为目标者的能动性和其他人对他们的声援。例如,当一些与“Gamergate”骚扰活动有关的团体攻击与“收回技术!”运动关联的女权主义网络权利活动家并发布有关进步通信协会的虚假说法时,参与该运动的组织和个人及其盟友联合起来,在一场“推特风暴”中作了反击叙事。此外,进步通信协会发表声明,纠正了对其工作的不实说法。¹¹⁹

支持幸存者

110. 提供支持和服务的在线社区已经建立起来,帮助目标或潜在目标作出反击言论,监测进行攻击的数字空间并帮助报告事件。¹²⁰ 例如,设在美利坚合众国

¹¹⁷ Global Disinformation Index, “Ad-funded disinformation: misogyny: narratives, affected brands and ad tech companies”, January 2023, 可查阅 www.disinformationindex.org/disinfo-ads/2023-01-04-how-is-ad-tech-funding-misogynistic-disinformation/。

¹¹⁸ Countering Disinformation, “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dimensions of disinformation”, 2021, pp. 20 and 21, 可查阅 <https://counteringdisinformation.org/topics/gender/4-promising-approaches-gender-sensitive-counter-disinformation-programming>。

¹¹⁹ Association for Progressive Communications, “Facts on #TakeBacktheTech”, 28 April 2023.

¹²⁰ Countering Disinformation, “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dimensions of disinformation”, sect. 4.

的 TrollBusters 网¹²¹ 向女记者提供支持，而乌干达的 HER Internet¹²² 则积极建立联盟和网络，作为减轻影响和打击虚假叙事的支持系统。

111. 国家和国际机构也被动员提供支持。例如，在印度尼西亚，人们利用人权组织的支持和国家人权委员会的“安全保障”，向 LGBTQ+群体提供声援，阻止对 LGBTQ+群体的攻击。¹²³ 当巴基斯坦人权律师尼格哈特·达德面临网络恐吓时，巴基斯坦律师协会理事会发表了一份支持她的公开声明，表示“对诽谤运动严重关切”，对“故意为女同事制造敌对的工作环境”严重关切。¹²⁴ 在国际一级，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发表公开声明，强烈谴责袭击女记者、人权维护者和性别平等活动家的行为。对国际媒体发出警报，也是一个重要策略，因为这是促使平台采取保护措施或对虚假信息宣传运动采取行动的最快方式之一。¹²⁵

社交媒体监测

112. 研究人员、从业者和民间社会行为者参与社交媒体监测活动，以便了解性别化虚假信息，确定打破性别化虚假信息的切入点，并倡导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挑战。¹²⁶ 同时，人们还在利用社交媒体监测来开发预警系统。¹²⁷

提高认识、数字和媒体扫盲以及能力建设

113. 民间社会组织积极提供的措施包括提高认识、数字和媒体扫盲、能力建设活动等。¹²⁸ 为了增强对选举中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认识，组织了大型的提高公

¹²¹ www.troll-busters.com.

¹²² www.herinternet.org/.

¹²³ Raiz Rizqy and Yulia Dwi Andriyanti, “We rise, we heal, we resist”, GenderIT.org, 22 March 2022.

¹²⁴ IAPL Monitoring Committee on Attacks on Lawyers, “Pakistan: Pakistan Bar Council and NGOs condemn smear campaign against advocate Nighat Dad”, 21 December 2020.

¹²⁵ EU Disinfo Lab, “Gender-based disinformation”.

¹²⁶ Countering Disinformation, “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dimensions of disinformation”.

¹²⁷ MediaFutures, “Disinformation Early Warning Data Tool (DEWARD)”, 可查阅 <https://mediafutures.eu/projects/disinformation-early-warning-data-tool-deward/> 以及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Journalists, “Online Violence Early Warning System”, 可查阅 www.icfj.org/our-work/online-violence-early-warning-system。

¹²⁸ 例如见 Foundation for Media Alternatives, “Marian Hukom”, 可查阅 <https://fma.ph/marian-hukom/>; Loyce Kyogabirwe, “Pushing back against gendered disinformation in Uganda”, Collaboration on International ICT Policy for East and Southern Africa, 6 February 2023; and South Asia Check, “Panos media monitoring initiative looks at trends in gendered online violence”, 9 June 2022。

众认识运动。¹²⁹ 就数字安全和安保、反击言论等一系列主题提供培训，并开发了工具包。¹³⁰

114. 培训和指导还侧重于记者和媒体机构，因为他们既是性别化虚假信息的目标，又是传播媒介。例如，作为《2022-2030 年黎巴嫩国家妇女战略》的一部分，黎巴嫩全国妇女委员会与媒体机构合作发起提高认识运动，并组织讲习班、开展研究，打击媒体和广告中的性别陈规定型观念。¹³¹

六. 结论和建议

115. 性别化虚假信息以性别偏见、陈规定型观念、性别歧视、厌女症以及基于父权制价值观的社会文化规范为武器，威胁、恐吓、排斥妇女和非常规性别者，禁止他们发声，使他们难以进入公共空间、担任权力职位。性别化虚假信息最恶毒的攻击针对的是那些属于少数群体或边缘化社区的人。它禁锢言论，阻碍人们实现抱负。

116. 性别化虚假信息的最终目的是减少公众参与，减少意见和观点的多样性(包括在媒体中)，削弱民主体制，摧毁包容性社会。因此，性别化虚假信息是非常危险的，迫切需要采取一致行动加以应对。

117. 性别化虚假信息是对人权的挑战，打击它的战略必须牢固地立足于人权，特别是表达自由。以打击性别化虚假信息的名义破坏表达自由的策略适得其反。由于性别化虚假信息的目标是剥夺妇女的权力，因此应优先考虑赋权而不是审查，优先发挥能动性而不是诉诸家长式方法。妇女的安全权与她们的发言权之间不能有取有舍。

118. 公司需要摆脱“一刀切”的做法，不能对性别化虚假信息和其他形式的虚假信息和性别暴力采用相同的方法。性别化虚假信息是高度背景化的，具有鲜明的特点和目标。平台需要更好地理解性别化虚假信息，并超越基于事实核查的内容审查来确定孰真孰假。他们需要确定在不同背景下增加性别化虚假信息风险的具体因素，并采取行动将其降至最低。

119. 研究表明，性别化虚假信息根据不同的背景和反应进行演变和调整。这种情况要求国家和公司采取积极主动的预防战略。

120. 各国也必须调整应对措施。对社交媒体的监管应该是“智能的”，重点不是内容，而是加强公司的尽职调查、影响评估、透明度和问责制，并要求公司审查设计、结构、系统和政策，以应对威胁。

¹²⁹ 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tTheCost: stopp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Electoral Systems, “Kenyans say, ‘We are #BetterThanThis,’ aiming to support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elections”, 19 July 2017.

¹³⁰ 例证见进步通信协会提交的材料。另见非洲媒体监测组织提交的材料。

¹³¹ 黎巴嫩提交的材料。

121. 各国必须重振努力，消除阻碍性别平等和强化歧视、排斥、偏见、陈规定型观念的结构性、系统性障碍，这些障碍正被性别化虚假信息宣传运动所利用。

122. 国家官员和政治领导人尤其有责任为包容性公共话语定下基调。他们在形成公共辩论和舆论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在国际法中享有相当大的政治表达自由。他们应该负责任、合乎道德地行使这一特权，促进容忍，而不是助长仇恨。

123. 虽然在打击歧视方面，以及在性别化虚假信息构成性别暴力或鼓吹煽动暴力的情况下，法律可发挥重要作用，但法律措施，特别是刑法，作为打击虚假叙事或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成见的武器，效果是有限的，而这些偏见和成见是性别化虚假信息运动的核心。

124. 在维护人权的同时打击性别化虚假信息，需要谨慎平衡各方利益。不能完全由公司自行决定，也不能纯粹由国家管制。法律，特别是刑法，在一些国家手中可能成为生硬、危险的工具。这种情况突出表明，必须制定全球标准，采取多利益攸关方办法，促进民间社会与国家和公司一道积极参与。全球数字契约谈判将是一个重要机会，让所有利益攸关方参与进来，就标准和方法达成共识，使所有人都能使用互联网，使互联网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安全的。

A. 对各国的建议

125. 各国应加大力度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通过法律、社会政策和方案，加强性别平等，消除性别陈规定型观念、消极的社会规范和歧视性法律、政策、做法和态度。

126. 各国不应发表、支持、鼓励或传播明知或理应知道是虚假的言论，也不应以任何方式支持传播性别化虚假信息。

127. 所有限制性别化虚假信息、仇恨言论或网络性别暴力的措施都应完全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特别是应尊重《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第三款和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的要求，并严格、狭义地对其加以解释。

128. 各国应尊重国际法所规定的性别、性和文化信息和表达应享有的保护，不应打着保护公共道德的旗号限制妇女的表达。

129. 刑法只应用于非常特殊和最恶劣的煽动暴力、仇恨或歧视的情况。现有的刑事诽谤法应予废除，必要时以适当的民事诽谤法取而代之。

130. 国家对社交媒体的监管应侧重于加强透明度、用户的正当程序权利以及公司对人权和性别问题的尽职调查，并确保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和职权范围得到法律的明确界定、保障和限制。

131. 各国应确保媒体自由和多样性，确保女性和非常规性别记者的安全。

132. 各国应通过强有力的数据保护法和其他相关法律，限制对个人及其在线活动的普遍跟踪和锁定。数据保护是重新定位广告驱动的数字经济商业模式的关键，这种模式推动了性别化虚假信息和网络性别暴力。

133. 媒体素养、信息素养和数字素养使妇女和 LGBTQ+ 群体能够从数字技术中受益，并建立他们对虚假信息、错误信息和网络暴力的抵御能力。这些形式的扫盲应纳入国家学校课程和国家发展计划。

134. 各国应履行促进实现知情权的义务，主动提供准确、可核查并按性别分列的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方面的数据和信息。

135. 各国应根据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下所作的承诺加努力，确保妇女能够有效、自由、开放、可互操作、可靠、安全地访问互联网。

B. 对社交媒体公司的建议

136. 公司应审查其商业模式，确保商业运营、数据收集和数据处理做法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公司应定期开展人权和性别平等尽职调查，并对产品进行影响评估，特别是评估算法和排名系统在放大虚假信息方面的作用。

137. 公司应审查其广告模式，确保这些模式不会对意见和想法的多样性产生不利影响，并确保广告模式明确规定用于定向广告的标准。公司应该在广告库中提供有关广告商的有效信息，让用户选择是否接收广告。

138. 公司应该提供有关算法或推荐系统参数的明确有效的信息，并确保这些系统能够使用户在默认情况下接收各种观点，同时能自行选择变量，塑造各自的在线体验。

139. 公司应制定明确的关于性别化虚假信息的内容审查政策，政策应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具有充分的透明度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应以当地语文的非技术术语阐述政策，并连贯一致地予以执行。

140. 公司在内容审查方面应遵循国际人权标准。为了处理与性别平等相关的有害内容，内容审查应注意当地背景和语文多样性。

141. 公司应提供易于使用、基于创伤信息的报告工具，这些工具可供具有不同技术素养的个人使用，允许对网络虐待进行本地化解释。这些平台应在社区组织的参与下，在国家一级建立协调机制，以便更好地查明性别化虚假信息案件、接收这类案件的报告、升级打击性别化虚假信息的行动，并制定主动的预防性战略。

142. 公司应发布全面、详细和有背景内容的透明度报告，其中有对性别化虚假信息相关内容采取的行动和对这些行动的申诉的细目，包括分享、浏览、影响范围、投诉和删除请求的数量。

143. 公司应针对更广泛的内容审查决策和内容类型，例如协同的不真实行为，建立内部申诉机制。还应考虑建立外部监督机制，如社交媒体理事会。

144. 公司应确保数据安全和隐私，确保数据的使用尊重国际人权法和相关国家法律，并在数据提供者完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

C. 对其他各方的建议

145. 雇主，包括媒体、政党、研究机构和其他在受性别化虚假信息影响的领域工作的人，应实行适当的政策和程序，识别和支持被性别化虚假信息锁定或有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的员工。

146. 学术界和民间社会应继续深化研究，与利益攸关方接触，并就性别化虚假信息、网络性别暴力和厌女仇恨言论提供政策建议。

147. 性别化虚假信息影响到一系列群体，包括在性别暴力和新闻安全领域工作的人、女性人权维护者以及那些与性别和性少数群体合作的人。应建立联盟，确保这些组织有足够途径访问平台数据，以便进行记录和风险评估。